皇后之玺:泥窝窝里抠出的国宝

文/新华社记者 韩 啸 杨一苗

那一年,孔忠良还是个淘气的少年。他没想到,从水渠边泥窝窝里抠出来的一块“白石头”,竟是件稀世国宝——西汉皇后之玺。

这一幕发生在53年前。

1968年,孔忠良13岁,住在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村。那时的孔忠良,总心心念念着他的“宝库”——离家不远的一段水渠。每天放学后,他都会来到水渠边,拣泡钉子和铜麻钱,这些东西可以给家里换些零用钱。

9月的一天,放学后,孔忠良又来到“宝库”里拾宝,无意间瞥见水渠边的一块石头,“白的,跟大拇指长短差不多,方不方,圆不圆,陷在淤泥里。”孔忠良回忆道。他用力从污泥中抠出这块“白石头”,抹掉污迹,看到上面刻了字,还蜷卧着一个动物。

这块“白石头”,随后被孔忠良的父亲孔祥发带往西安,转交给文物部门。经专家鉴定,这是刻有四字篆书“皇后之玺”的皇后印玺,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。

2.8厘米见方,通高2厘米,重33克,皇后之玺以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,玉色纯净润泽,玺钮为高浮雕的螭虎形。玺台四侧面呈平齐的长方形,刻有长方形阴线框,其内雕琢出四个互相颠倒并勾连的卷云纹。

“这枚玉玺是证明皇后制度的最早文物,也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两汉时期等级最高且是唯一的一枚帝后玉玺。”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管理部主任贺达炘说。

据《汉宫旧仪》记载:“皇后玉玺,文与帝同,皇后之玺,金螭虎纽。”贺达炘说:“白玉、螭虎,这些都高度吻合汉朝文献中帝后用玺要求。而篆书‘皇后之玺’四字,方正、规范、匀正、充实,是典型的汉代篆书特征,对后期产生了深刻影响。同时文字留白布局合理,堪称引领了后代的印章艺术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,这枚玉玺是同时代印章中属于礼制最高、体积最大的。贺达炘告诉记者:“西汉时期没有纸张,印章是被用在封泥上,作为竹简等文件的封印标记,所以相较于后世纸张用印,它的尺寸要小一些。”

那么,这枚玉玺又属于西汉哪位皇后?目前学术界比较统一的观点认为这枚印章是汉高祖皇后吕后所有。当时孔忠良捡到印章的地点位于汉高祖刘邦长陵西边,离吕后陵墓的封土也很近,就是有力的证明。

如今,皇后之玺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。2010年,博物馆还给孔忠良颁发了证书。

时过境迁,当年捡到印章的少年孔忠良如今已过花甲之年,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捐赠往事,他乐呵呵地笑了:“咱就是个农民,实诚是根本。捡到了宝贝不交给国家交给谁!”

《捞铁牛》的牛,到底有多牛?

文/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

在蒲津渡遗址博物馆,4尊铁牛排成两排,面向黄河,怒目圆睁,侧耳聆听,前腿蹬,后腿蹲,好像在进行拔河比赛……

千年时光流转,铁牛几经沉浮,每次“面世”都备受瞩目。宋朝怀丙和尚捞铁牛的故事,因写进小学课文而家喻户晓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里,牛是镇水神兽。这几尊铁牛“生”来就被寄予守护黄河安澜的美好愿望。

山西省永济市蒲州故城西门外不远便是蒲津渡遗址。这个著名的黄河古渡口历史悠久,曾具有重要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战略意义。唐开元十二年,唐玄宗倾全国之力,派人铸造铁牛为地锚,修建坚固的浮桥,改“竹缆连舟”为“铁索连舟”。

一时间能工巧匠汇聚于此,热火朝天地铸造以铁牛为代表的铁器群。他们以黄蜡雕塑造型,将澄泥涂于蜡模外,用火烘烤,待泥模烘干后蜡液排出,再堵住排出口,灌入洪流般火热铁水,当铁水凝固后打碎泥范,铁牛顺利成型。

专家测算,这4尊铁牛每尊重达45吨至75吨不等。这批铁器群为低硫低硅灰口铁,是木炭冶铸的产物。当时唐朝生铁产量已很丰富,因此有条件用在工程上做浮桥地锚。

“这是一项国家工程,无论铸造技术还是雕塑艺术,都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。”曾负责铁牛考古发掘工作的考古专家刘永生说。

仔细观察,大铁牛头戴漂亮头饰,骨骼粗壮,肌肉丰满,牛角形似犀牛角,长尾甩在背上,牛气袭人,铁骨铮铮。4尊铁牛相似中有不同,写实里蕴含夸张成分。

“铁牛选用的是我们当地晋南大黄牛的造型,看上去憨厚朴实,又有雄浑厚重的气势。”蒲津渡遗址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尉会萍说。

除了“帅气”,铁牛造型还是美与力的联姻。

在每尊铁牛底板下方,有和牛身相连的6根长铁柱。它们向前倾斜,牢牢扎入地下,使地面上的铁牛可以承受来自浮桥的水平拉力。

专家们考证,在对蒲津浮桥不断维护下,黄河两岸8尊铁牛连续“工作”了约500年,直到蒲津浮桥被金元战火毁掉,它们才卸下肩头重担。

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”随着黄河逐渐向西改道,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铁牛也渐渐没入泥沙。从此,民间流传着有关黄河大铁牛的各种美丽传说。

永济市博物馆原馆长樊旺林坚信铁牛的存在。他深入黄河滩涂探查、到民间走访,1988年开始正式寻找铁牛。一年多后,黄河东岸的4尊铁牛,连同铁人、铁山、铁柱等面世,樊旺林百感交集,流下激动的热泪。由于临近黄河,空气潮湿,地下渗水不断,出土后的铁器腐蚀严重,锈迹斑斑。黄河西岸的4尊铁牛仍埋在泥沙里,没有被发掘。

黄河大铁牛的发现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。经过两次考古发掘,人们将铁器群在发掘原址上提升了12.2米进行保护展示。

“考古发掘印证了宋代怀丙和尚捞铁牛,重建蒲津桥的真实性。”刘永生说。

如今,卸下重担的铁牛们依然膘肥体壮,一幅“沧桑未改牛脾气,进退还凭铁骨头”的气势。中国桥梁专家唐寰澄认为,唐开元铁牛是有实际功能的艺术珍品,是世界桥梁史上唯我独尊的永世无价之宝。

古代春牛兼辟瘟疫

《史记·天官书》谓:“正月旦,王者岁首,立春日,四时之始也。”怎样庆祝和迎接“四季之首”和“一岁之始”?传统农耕时代采取统治者“扶犁亲耕”等仪式,鼓励引导老百姓重视发展农业,而牛在一系列“迎春”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
史料记载,中国人对牛驯化的历史,可追溯到伏羲氏时代。依据甲骨文和金文的“犁”字“牛”旁的想像,古人很早就对牛进行役使,使其成为重要的耕战资源,并受法律严格保护。约作于公元前370年左右的《清华简·系年》称,“周天子”成为中国辽阔大地的统治者,象征之一便是“帝籍田”,而把“不籍千田”视为政权衰落的重要标志警示后人,以后的王朝建立者谁敢轻视?按《国语·周语》的说法,“帝籍田”并非指周礼系文献所说帝王春耕之类的“籍田礼”,它包括择日、戒斋、设坛、耕田、太宰等一系列大型节目,此项活动一般持续10天。而牛是“耕田”和“太宰”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。

西周初期创立“亲耕籍田”后,历代统治者遵行不替。从汉文帝“其开籍田,朕亲率耕”、唐太宗颁布“籍田诏”和恢复籍田仪式、宋仁宗“朕既躬耕,不必泥古,愿终田以劝天下”到清雍正帝即位伊始即行“亲耕礼”,“籍田礼”从未因朝代更替而消失。

有趣的是,皇帝驱牛犁田虽为“表演”,但牵引木犁行进的耕牛却是不折不扣的健壮“神牛”,围绕其表演的辅助节目、道具等随时代发展不断演变。

到了社会稳定、经济繁荣的宋代,官方、民间纷纷主办声势浩大的“迎春”活动,随老百姓参与度、满意度大幅提高,其观赏性、娱乐性、趣味性和市场性很快熔为一炉。立春当天,皇帝由一帮大臣陪着去“犁田”,而市面上出售人造“春牛”玩具的商铺生意也异常火爆,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谓:“至日绝早,府僚打春。府前左右,百姓卖小春牛,往往花装栏坐,上列百戏人物。”意思说,立春那天一大早,政府领导和一般职工举行“迎春”仪式。开封府前边的两条大街上,摊子上出售的小春牛玩具,都用彩花装饰并放在“牛栏”里,上面还排列着表演百戏的各种人物。大家还相互赠送为迎春特制的小旗子和点彩的柳枝。

不过,宋人庄绰史料笔记《鸡肋编》卷上却说出“春牛”的另一种作用:“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,以岁干色为头,支色为身,纳音色为腹。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,支色为胫,纳音色为蹄。至于笼头缰索与策人衣服之类,亦皆以岁日为别。州县官更执鞭击之,以示劝农之意。”老百姓也跟着去打碎春牛玩具,小孩子们一哄而上就去抢碎块。河东(今山西西南部和陕西葭县以北一带)认为泥捏的“春牛”“兼辟瘟疫”,一些人家把抢到的一点泥“春牛”的肉悬挂于床帐防疫,并“调水以饮小儿”。庄绰还说,为争抢泥“春牛”的肉,有人不惜大打出手,“竟致损伤者”。南宋诗人杨万里触景生情,还写下一首《观小儿戏打春牛》:“小儿著鞭鞭土牛,学翁打春先打头。黄牛黄蹄白双角,牧童缘蓑笠青篛。”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